

那年我上高复班

□仇赤斌

又到一年高考时。现是六月,这几天还比较凉爽,我们那时是七月高考,骄阳似火,人称黑色的七月。这个称呼对我第一年的高考最合适不过了——1991年的7月,我高考落榜了。

记得从母校拿到成绩单后,没有和班上其他同学打招呼,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出了学校。那天是个艳阳天,我却觉得是暗无天日。天仿佛塌下来了,心中那种绝望、彷徨、无助之感,难以形容。

虽然心中有预感,觉得这次没考好,但没想到考得这么差,只有485分,离最低的大专分数线还差20多分,高中三年算是白读了。母校是县中,省重点高中,都说进了县中,半只脚已迈进了大学。但高中三年我不够努力,兴趣太多,别人在看书的时候,我在进行所谓的“素质”教育。人的精力是有限的,在其他地方花的时间多了,学习时间就少了。高三文理分班时,其实是文科偏强,结果选了理科,终于酿成了苦果。我不甘心,真的不甘心,但问题是如何向父母交代?

回到家,母亲还安慰几句,父亲铁黑着脸,沉默半天后想让我去学手艺。我一向比较怕爸,但关系到前途问题,还是鼓起勇气说:“爸,让我再试一次吧,如果明年还是考不上,我就听你安排!”再复读一年定下来了,但到哪里去读书呢? 那年不知咋回事,全省范围内禁止办高复班,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。联络其他落榜的同学,到处打听哪里有高复班,后来听说鄞江有老师在办学习班,鄞江离老家不到10公里,就去了。

负责的老师是教生物的,从鄞江中学再找几个老师,还不是最好的,就办起了高复班。交费后就开始上课了,既然被禁止,当然不能明目张胆地上课,教室选在一家企业的食堂,里面黑乎乎的。住宿则各显神通自己解决,多是租民房,走读。我的准姐夫在一家矿山机械厂上班,他和一个同事两人合用一间宿舍,其实就是换衣服的地方,换下的衣服油腻腻的,满是机油、柴油味,他们不住宿,这间不到8平方米的小间就成了我的宿舍。宿舍在北侧,背光,后面还有一家工厂,有时全夜开工,都是机器的轰鸣声,让人难以入睡。条件是不好,但免费,厂里的食堂还可以搭伙,解决了吃饭这个大问题。

吃住问题解决了,剩下的就是学习了。每天骑着自行车到五分厂的食堂去上课。摆在自己眼前的是如何提高学习成绩,关键是要提高数理化成绩,只能多看书、多请教、多做题。这次是真的用功了,除了上课,基本上窝在宿舍里看书、做题,晚上学到十一二点。每次考试都在慢慢进步,名次在不断上升,自己也有了信心和动力,考后老师说没想到我能考班上理科第一。

毕竟年轻,不可能整天待在房间里。学累了,下来打打篮球,楼下就有一个篮球场,楼内还有好几个读高复班的,有时打个半场、有时定点投篮。樟溪离得很近,天热时可以去游泳。鄞江是个生活的好地方,山清水秀,每逢十月十、三月三有庙会,和同学成群结队地去逛庙会。镇上很繁华,有钱有闲的可以去打台球、滑旱冰、看电影、看录像,娱乐地方多的是。班上有男女同学恋爱了。

记得1992年高考作文是漫画题,我作文的题目是《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》,而我也一直将此作为人生的信条。那年总分120分的语文卷,我考了91分。我的总分是571分,浙江省重点线是550分,我的分数比1991年的485分提高了86分,其中数理化就提高了84分,努力还是有了回报!

人这一生,总得拼一回。高复班这一年,生活是充实的,我们从学校里一下被扔到了社会上,没人管你,吃住学一切都要靠自己,是奋争还是沉沦? 由你自己掌控。在这一年里,初步踏入了社会,人慢慢成熟起来了,有时感觉四年大学都还比不上这一年。这是我一辈子的财富,至今还在收益。

1977,我的高考

□舒云亮

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临,我想起了那一年的高考,那是1977年。

那一年,停顿了10年的高考招生制度恢复了。凡是1966年毕业至1977年的应届生都能参加当年的高考,考生年龄跨度有点大。作为1974年春季的高中毕业生,我可以参加这次高考。

那一年,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已经三年多。对今后的道路有些迷茫。谁料想,10月的某一天,就在我临时返回母校十三中学做代课老师期间,学校传达了关于恢复高考制度的文件。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,喜悦、激动、不安、期盼,心中像打翻五味杂陈瓶子,各种滋味涌上心头。我对自己说,这也许是我的人生转折点,行动吧,小伙子。

于是,我辞去代课老师的职务,向学校图书馆借了一些高考复习用书,主要是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,因为我们读书那会儿基本上没学过史地知识。拎着一大袋子的书本,我回到了务农的地方——我的祖籍奉化舒家村。

在那儿,我白天参加农业劳动,晚上复习功课。虽

然苦,但内心充实。我的人生不再迷茫,我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,并朝着既定的方向努力着。

高考制度恢复那一年,没有全国统一的试卷和考试时间。试卷、时间、考试形式由各省自己规定,浙江省分为初试和复试两个考试阶段。初试通过才能参加复试,复试通过方有机会进入大学。

那年的初冬,我走向考场——奉化舒家学校。教室里坐满了考生,真有传说中的“千军万马挤独木桥”的场面,而当我再次走进这个学校参加复试时,教室内的考生少了许多。我至今记得复试时语文试卷的作文题目有两个:“怀念”和“十月”,考生可任选一题写作,我选了“十月”。在历史的长河中,十月是那样的波澜壮阔,那样的振奋人心。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,1949年我们新中国成立和1976年党中央粉碎“四人帮”……

复试结束,大多数考生静候佳音,而我因为填报的第一志愿——上海海运学院远洋运输业务专业的特殊性——文科兼英语专业,所以得加试英语笔试和口试两种考试。

先是英语笔试。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,整个奉化西坞区只有我一个考生参加英语笔试,考场内我是那个唯一的考生,监考老师倒有三个,六只眼睛聚焦在我身上,很不自在。好在我英语基础比较扎实,很快就做完试题,轻松地走出了作为考场的办公室。由于英语笔试很顺利,在回家的路上,我蹦蹦跳跳,很快就走完了十五里路。

难忘次年1月的那个冬日早晨,天气很冷,地上结了一层薄薄的白霜。我从江北的家里出发,走了大半个钟头,来到宁波二中,参加英语口语。这时太阳从云层中探出脑袋,对着我笑得那么灿烂,把我的心房照得暖暖的,暗暗在心里为自己加油,然后走进教室。面试的英语老师来自杭州大学,四五十岁的样子,高高瘦瘦,戴着一副眼镜。他和气地示意我坐下,叫我别紧张,先简单地用英语交流了几句。问我叫啥名字、几岁、工作否? 我用英语一一作答。对话中气氛逐渐变得轻松,最后他让我用英语说说雷锋,我用了十多句英语概括讲述了雷锋平凡而又光辉的

一生,最后以“我们要向雷锋同志学习”为结尾。那个年代,雷锋是我们年轻人的楷模,对于他的经历和故事我们都相当熟悉。整个面试过程我都对答如流,面试的感觉很好。

1978年早春,公社贴出了高考录取名单的红榜,我榜上有名。我们公社考上大学的仅为三名,另两个分别是农村学校的民办老师。几天后,公社分管教育的干部来我家,将上海海运学院录取通知书递给了我,那一刻我激动得都忘记向他表示感谢。

据报道,1977年全国有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这个神圣的殿堂,而被录取的只有27.3万,录取率约4.8%。

1978年2月下旬,我跨进了上海海运学院的大门。我大学同窗的年龄参差不齐,最年轻的是应届高中毕业生,年纪大的是几个已经有了孩子的老三届生。

那一年的高考我终生难忘,经历的四次考试恍如昨天。



二叔圆了大学梦

□钱浩宇

当年,为了响应号召,刚上高二的二叔到农村接受锻炼去了。那里生活很苦。渐渐地,他对回城也就不抱希望了。后来,他结了婚,还有了两个儿子。

1977年的一天,二叔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。他对父亲说,现在全国恢复高考了,他想试一试。他说,上大学是他的梦想。结果很惨,二叔仅以一分之差落榜了。

第二年夏天,二叔又来了。考试那天,二叔骑着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,车后架上驮着我一起去了考场。我们动

身很早,原因是他沿途要捡空酒瓶。他说,儿子的钢笔坏了,要再买一支。到了考场,他进去了,我在门口看车顺带看空瓶子。中午,二叔在学校的院子里啃几口干馍,喝几口凉水,午饭就算打发了。高考结束后,二叔居然攒到了十几个空瓶子,拿到收废品的地方换了四块多钱。他说,买支钢笔,够了。不知怎的,我心酸得想要掉泪。

二叔返回农场后,收到了录取通知书。那时候,因为刚恢复高考,国家政策特别好。考上大学,既不收学费,还包分配。进了大学,如同进了保险箱。对二叔来

说,这当然是进入城市工作的好机会。但二叔实在舍不得抛下老婆孩子自己去享福,所以悄悄把录取通知书藏了起来,一个字也不曾提起。

二婶和孩子们问他考上了没有,他含糊其辞地说,考上没考上,还不是一个样儿。二婶就笑他,考不上就算了,还嘴硬! 你压根儿不是那块料!

二叔只是笑笑,什么也没说。后来,二叔大病了一场。去世前,他对二婶说,我要走了,把录取通知书给我,我要带着它上路。二婶这才如梦方醒,泪如雨下地说:“我就知道,你是有本事

的。你是舍不得咱们这个家,所以骗我啊! 你啊!”

二叔说,只要考上了,我的梦想就算是实现了。对我来说,穷家难舍啊……

一年一度的高考时节来临了。面对现在的高考学子,我突然又想起了二叔。多年前,为了圆自己的大学梦,他付出了很多。而为了整个家庭,他最终毅然放弃了“鲤鱼跳龙门”的机会,让我读懂了普通人的爱情,质朴而真挚。